

SUBALTERN STUDIES

 另类视野
文化 / 社会研究译丛

庶民研究

刘健芝 许兆麟 / 选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SUBALTERN STUDIES

A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TICS

庶民研究

ISSN 1533-7909

Volume 14 Number 1
Spring 2006

 另类视野
文化·社会研究译丛

庶民研究

Subaltern Studies

印度另类历史术学

刘健芝 许兆麟 / 选编
林德山 等 /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庶民研究 / 刘健芝 许兆麟选编.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另类视野)

ISBN 7-80109-640-1/C·80

I. 庶…

II. ①刘… ②许…

III. 平民—文集

IV. D0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6932 号

庶民研究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西直门内冠英园西区(100035)

电 话: 66560272(编辑部) 66560299 66560273(发行部)

h t t p: //www.cctpbook.com

E m a i l: edit@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340 千字

印 张: 14.625

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80 元

序一：一线之差

——封闭/开放的(历史)阅读

◆ 许兆麟 刘健芝

尼采在《不合时宜的思辨》中的“历史于生命之用与害”一文，开首引用了哥德的说话：“再者，任何事情仅是教导我而不能加强我的活力，使我更有生气，我都厌恶。”庶民历史研究系列就如尼采的历史书写实践的系谱学般，能使人眼前一亮，从习以为常的世界的阴暗处，观照出不同的世界、不同的旅途。

庶民历史不在于增加、丰富“人类”的知识库，不在于补充主流学术权威所认许的历史的遗漏，即不在于使读者在原有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不在于一般意义上的教导^①。活力和生气的激发意味某些根本改变发生了，而庶民历史的力量就在于召唤这样的改变——对惯常的阅读习惯、思想倾向、价值认同等提问和改造，从而

^① 迪皮斯·查克拉巴提在其收录在本书中的《少数族群的历史，庶民的过去》一文中，似乎持着相反的看法。即庶民历史书写仍是作为制度化的历史学科的一部分来看待，其贡献在于加强历史书写的民主精神和面貌，及丰富历史知识。他没有如尼采般，对历史作为一学科所要求的理性的普遍性标准，予以彻底的质疑，他关心的是知识的民主化的问题。即“知识”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而不是作为实践的一部分来看待。“知识”还是客体化的对象，抽离了“用”的政治。

在过去看似不可能活动的处境中看到可能活动的空间。换一种形象的说法,如果“眼睛”是“灵魂”的窗子,那么对庶民历史研究学者而言,主流历史——其权威为我们普遍接受的历史——遗漏或不重视的做法才是它的“眼睛”,才是我们要注意的地方。在这里,而非在我们已习惯了不去怀疑的明亮的地方,我们不但能察看到让主流历史可能的“灵魂”的作用所留下的痕迹,这些痕迹也反映了我们的“眼睛”是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打造出来的。就我们本身的经历而言,经验总是受到冲突矛盾的困扰,总是有说不清楚、暧昧、不能确定、偶发的时候,总是有种种有时非常激烈分明、但多是暧昧不清的感情左右着我们的思想行径,但就主流的历史叙述而言,一切明确和不明确的东西似乎都可在因果分明的逻辑关系中找到位置组织起来,即按照以普遍性为标准的概念组织起来。问题不但是日常生活的经验和作为专门学术的历史叙述之间的不一致:前者多是千头万绪梳理不清的矛盾和偶然的東西,后者却是追求严谨科学性理路清晰的叙述。问题更加是当我们(包括历史学家在内的大多数人)因为没有能力去掌握自己的生活及周遭的情况而备受困扰时,我们会不怀疑地接受主流历史叙述的权威,接受其建立并依赖的“理性—非理性”的二元框架,接受其重“理性”轻“非理性”的倾向。尼采的思考是要质疑这似乎是现代社会的现代性的理所当然的基础,质疑当前普遍认为是“好”的东西,所以是“不合时宜”的,但唯有这样的质疑,才能突破对“理性”的执着所徒具教导作用的规限,才能突破对思考的想像的贫乏,才能突破偏执地认为“客观”和“理性”取决于能否和认知对象或研究对象保持清心寡欲的距离,亦唯有通过这样的质疑才能唤起活力生气,在似乎前无去路之处看到“科学”和“理性”所不能想像的“未来”。

庶民历史就是这样的不合时宜的思辨、提问。

从一般常识到学术界的主流,历史就是过去了的事情,已经发

生了的实实在在的事实,对历史的认识就是一种知识的掌握,历史的书写就是通过文字把某种传统记录下来,让后人阅读并吸收成为他们的记忆的一部分。作为一种知识,一种认知的对象,作为“他者”,历史被普遍看成是在过去发生了的事实陈述。所谓历史事实自然不仅仅是一块石头、一栋建筑物、一些档案、一些没有随着时空变易消逝而仍得以留下来的痕迹,而是经过重构表述出来的叙述,而它又被认为与故事或文学的叙述不同,因为后者是虚构的。历史作为一门科学,自然不会缺少其学术制度和权威,通过认可的标准、规则、步骤、方法和真理来判断什么是历史事实,什么是虚构的。

事实和虚构的分辨不但是“真”和“假”的分辨,同时还是“客观知识”和“主观想像”的分辨。“真”和“假”绝对对立的二分法意味着“知识”必须绝对客观,不受任何个人的情感左右。这就是说“知识”不可能是一般的经验,因为一般的经验不可能没有情感的作用。也就是说守卫和生产“知识”的“知识分子”不可能是一般的人,因为他们必须能够超越一般经验。换句话说,知识分子要通过接受学术(科学)的训练才能有超越一般人的成就,即成为精英。简而言之,科学关于真实与幻象的分辨的前提,所涉及的问题不仅在于是否能提出站得住脚的知识论的论据,其相应的关于事实和虚构的辨别跟精英和一般人在社会上的划分是扣连在一起的。和事实与虚构紧紧扣在一起的划分有理性/非理性、科学/迷信、现代/传统、客观/主观等的划分,而所有这些在知识论上的划分同时为现代社会的等级关系提供了合理化的概念。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在这方面的作用既深且广。在这方面的探讨,福柯(Foucault)及受他影响或与他呼应的知识分子有发人深省的洞见。他们指出现代社会科学各门知识不但和种种社会控制的技术关系紧密,其建立更有赖于维系、生产、繁衍权力关系的机制的运作,即社会科

学在社会制度、生活的组织以至每个人的“自我”的打造都有关键的规范作用^①。

“真”/“假”、“正确”/“不正确”、“理性”/“非理性”、“客观”/“主观”等一系列的二分法是这些学科权威依赖的好/坏标准，“好”的便能成为这个权威的一部分，并进而巩固维系权威的机制，“不好”的便被排斥或只能在不受重视的边缘位置活动。这些似乎只是在知识论的范围内确立的辨别标准，实际上和针对“他者”的价值判断及决定谁可得到认可的权力，有着纠缠不清的关系。二分法不但像是在这些关系上涂了一层隐形水，使它们不易辨认，还因经年累月的作用而变得理所当然，而成为（纯）理性的神话。福柯在阐述尼采关于历史书写的观点时说，尼采指出历史书写在追求成为一门现代史学，以跻身于科学知识之列的努力，并没有使它从形而上学中解脱出来，因为其主张的科学理性是植根于事物的纯粹性的形而上学的假设上——事物的同一性、本质、本源等的假设。尼采认为历史书写若能细心聆听历史，就会发现事物背后的东西和这些假设完全不同：“没有什么永恒的本质……‘所谓’本质是零碎地东拼西凑而来的。系谱学历史书写审视理性的历史会发现，理性是从完全‘合理’的方式中产生的，即在偶然中形成；对真理和科学方法的精确的追求及专注，均缘于学者们的感情、互相憎恨、狂热、没完没了的讨论和竞争精神——理性的武器是在私人间

^① 除福柯的著作外，可参考 Gary Gutting, *Michel Foucault's Archaeology of Scientific Reason*, US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Nikolas Rose, *Governing the Soul: The Shaping of the Private Self*, London: Free Association Books, 1999 和 Graham Burchell, Colin Gordon and Peter Miller (eds.), *The Foucault Effect: Studies in Governmentalit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的冲突中慢慢打造出来的。”(Foucault 1980: 78)

尼采还直指所谓真理,是前人的错误经过漫长的烤制过程,久而久之之僵化定型下来。(Foucault 1984: 76—100)

上述只是“西方文化”中抗衡主流对知识生产和表述的规范而作的自我批评的一些例子。这些对自己植根的文化批评并非要反“传统”、反“理性”,因为自居“反面”的批评不但和他们所反对的是做着相同的事——对同一性的肯定,仍是在他们所反对的思考框框内运作,分别只不过是人家说是,他们说不是。深深植根其所批评的体制内的人,不会因为这个体制的结构上分布的位置有让他们说不的可能,便能独立于这个体制外。上述的自我批评要拆的是主宰着主流知识分子和常识的理性的神话。他们指出,理性的结构性条件并非什么凌驾物质感情世界的先验条件,其基础也不是什么先验主体。理性的有限性和盲点有其历史偶然性的结构,即其有限性是开放的结构,而不是封闭的,其活动是有其倾向和偏好,而不是超然的,而这些倾向和偏好也是种种诸如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人际等历史条件偶合下内化而成的。所谓倾向、偏好、盲点等是一种方便的说法,因为这些用语惯常都假设了独立主体是这些“属性”的载体。这问题在后面谈到视角(perspective)和认知失误(cognitive failure)的问题时再谈。(见本辑达斯(Veena Das)的《作为探讨视角的庶民》及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的《庶民研究——解构历史编纂》)

此外,针对理性的神话作出批评并不是说不需要用心思考。若说思考的理据不可能有绝对明确和有普遍性的保障,这只会使思考的问题变为更加严肃的问题——不能因循守旧,也不能只诉诸权威或相信可依靠逻辑作为裁决对错的最终标准。福柯在讨论尼采的系谱学一文中,开首便说明系谱学是灰色的、缜密的、富有耐心的、纪录性的。灰色即不是简单的白色或黑色,是不黑不白,

不是鲜明的这样或那样,要在微细、琐碎处下工夫,即对正轨、大问题忽视的地方细心阅读,才能捕捉到黑白二分法强暴的痕迹。系谱学要能明辨灰色中混杂的浓淡不一的色调,便要仔细阅读广泛的材料,以严谨的方法把不起眼的、看似不重要的点点滴滴扣连起来。(Foucault 1984: 76—77)

他们根植的“西方文化”把我们建构为在他们的世界的另一边:即如萨义德(Edward Said)所说的,通过东方主义(Orientalism)的研究,把我们营造为“他者”。“东方主义”对“他者”的欲望及引发“东方主义”研究兴趣的和“他者”接触的历史说明了为什么他们的自我批判值得我们参考。萨义德指出了东方主义在“西方”强加于别人身上的种种殖民计划里有关键的战略意义。但他们值得我们参考更加是因为,“东方主义”通过漫长的、暴力的历史过程,造就了“他者”也认同了它所披在身上的“科学”、“理性”、“现代”的外衣为理所当然的好的东西。换句话说,这个能以不同形式、至今仍在加速发展的漫长的殖民历史,不但是外力的殖民作用,同时还是形于内的殖民作用。庶民历史研究面对的便是这种复杂纠缠不清的、既宰制又造就我们的力量——我们深深根植其中的力量。

迪皮斯·查克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在《少数族群的历史,庶民的往昔》一文中,指出“minority”(我们在这里译作少数)和“majority”(一般作多数)不是数量上的多寡问题,而是在权力关系上的弱势和强势的相对关系。西方在全球人口是少数,但他们的历史却定下了标准,主宰着其他社会的想像和衡量自己和世界的尺度。古哈(Ranjit Guha)在《历史的细语》简略谈了这些标准的形成和引进印度的过程。他指出现代史学的形成可追溯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而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的论述最能代表现代史学的开始。

古哈指出,对马基雅维里而言,历史研究对建立及巩固国家政权的手段和治术的研究是相同的。这是国家主义主导的现代史学的开始。在其后的300年,这种历史研究的取态越来越根深蒂固和制度化,在19世纪的西欧发展成为一门权威的学科,在学术界拥有了正规科学似的身分,并随着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而引入印度。古哈所说的国家主义的现代史学是指围绕着统治和政权叙述的历史,即以政治史为主,而政治则是从国家的立场出发,关注的是国家的兴衰、国家的法律、制度及秩序的建立或崩坏以及国际关系。

至于历史研究方面,要以文献,即来自政府及保存在档案库的官方纪录为基础。这样才可保证整理出来的历史以事实为根据,缺乏此一基础,研究便不可能是客观的。上面已一般地谈过所谓客观知识依赖的二分法的问题。这套二分法涉及以欧洲中心的现代史学对非西方的殖民地历史的研究时,不足之处更见明显。

古哈指出,从殖民统治者为了配合其侵略和统治印度而搞的印度史,到民族主义者为了抵抗殖民统治争取独立而编纂的印度史,都是书写精英的历史。对殖民统治者而言,他们是在印度执行教化“他者”——被殖者——任务的精英,他们给被殖者的恩泽是通过教导和纪律训练使他们达到教化者的水平。殖民主和被殖者的关系在历史的表述中是主动积极相对被动消极的关系。对民族主义者而言,他们并没有否定教化他们的欧洲中心的现代化标准(甘地是例外,请看此辑收录的查特伊(Partha Chatterjee)的《甘地及其对市民社会的批评》),只不过是把殖民主加于印度人身上的被动消极形象反过来变成积极独立自主的主体。查特伊在他的文章里称这为倒转过来的东方主义,因为民族主义者通过内化采纳了欧洲中心的现代化标准来看自己和别人——即他的积极独立自主的主体仍是通过客观的科学意识,普遍的知识、理性等西方标准所界

定的。

德塞尔托(Michel de Certeau)尖锐地批评了形成这些普遍标准的心态和行为,他指出,现代西方文化的一个构成要素,是理解的活动是建基在和“他者”的关系上的,即理解主体,不管是一个群体还是个人,是通过为其排除在外的“他者”来界定属于自己的范围,让自己成为合法、正当的东西,通过从为其支配的“他者”探取到的“自白”中发现自己的信仰。即其身分及信念是建立在对立关系的建构上的。“我”是“非非我”,“他者”的“异质”说明了“我”的“同一性”。人文科学就是关于“他者”、建基于“他者”而成就的“知识”。所谓“自白”不是来自主体的自我剖白,而是来自“他者”的沉默,来自探索者跟自己划分开来的等待他去认识的领域。德塞尔托举现代医学为例,指出在17世纪和18世纪之间,身体在现代医学的视野下,转化成为一片面积,如一本书般打开了内在,或如一副静静躺在眼前的尸体。这一转化使身体变成一个等待译码的密码,使身体从被看见的身体变为被认知的身体,即在空间组织起来的身体变成了一套组织起来的语言。德塞尔托又指出,现代史学也经历了相似的变化,把在生活中流传的传统变成一整套文献资料,展露在博学者的好奇心之前。德塞尔托指出现代医学和现代史学几乎是同时诞生的——通过把被认为有阅读和书写能力和认为是用未知的语言书写成的部分分裂开来,使后者成为等待前者破解的东西。

因此,为争取独立而编纂自己的历史的民族主义者,在建构集体认同及自我肯定时,仍是以东西方的二分法为前题,仍是以建构外在“他者”和“自己”划分开来为依据。所以民族主义者的集体认同和自我肯定的论述只不过是把在殖民统治下的民族主义者精英的领导名份取代了殖民统治论述中的精英领导的位置,而没有脱离这套论述的国家主义的规范。在西方,国家的活动、法律、制度

影响及社会整体在某程度上得到认同,因此以国家活动为中心的视点,最少也可被视为对社会整体的俯视。在19世纪的殖民地印度,殖民政府直接涉足的地方,范围不大(Guha,“The small voice of history”, Subaltern Studies IX p. 4, this is for your easier reference in looking for the page number. After checking the page number of the Chinese version, please delete the entire paragraph in red),作为外来的军事和商业力量,殖民统治是通过征服对方而不是得到认受来达致的。因此殖民地的国家机器和印度的社会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不一致的,所以围绕国家机器的历史,以国家机器的位置出发的视点对整理印度历史帮助不大。

这个例子明确地显示了国家主义的现代史学的盲点——广大人民在历史的叙述里是缺席的,国家主义史学的叙述没有他们说话的位置。这个例子更说明了这个盲点是国家主义的现代史学的支点,因为只有在这个盲点的基础上才能把国家或民族运动建构为统一的能动主体,才能简单地把历史看成是过去、现在以至未来的线性时间发展,并以进步—落后的二分法构成的尺度来衡量它,才能以现代性、现代化、理性、进步、统一的中心等为普遍的标准。若要让人民恢复说话的位置,正如庶民历史研究所努力的,欧洲中心的现代性标准便失去普遍性的意义;真/假、线性时间、现代法制、社会秩序、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组织、理性等现代标准的绝对性,便要承认本身的抽象、简化、任意性,这样才能把六根打开,不再自闭于把他人划为“他者”的“自我中心”,谛听到历史载着多种多样的细语微音的痕迹。

古哈对这通过排除“他者”于外建构精英的“自我”的做法的拆解是,提出精英—庶民的相对关系,通过对精英的表述的逆其文理的阅读,在字里行阅读到被掩盖了的庶民的痕迹,重构庶民的充满差异性的历史叙述。

我们该如何看待精英和庶民的相对关系呢？这是否以另一种二分法来取代真/假、过去/现在、传统/现代、客观/主观、科学/迷信、事实/虚构、理性/非理性等一系列的二分法呢？所谓二分法是指两个独立存在的实体的对立关系。前面提到了德塞尔托对现代西方文化认知结构的评语：体现现代理性的认知活动，是建构作为认知对象的“他者”的活动，并从而建立“自我”的认同，即现代理性的认知活动是以划分“他者”和“自我”的二分法为基础。现代西方文化里的其他二分法均以此为前提，因此，不管自觉与否，都与建构内外分立的身分认同政治有内在的关连。

庶民的历史研究是否同样是通过否定“他者”来确立自己呢？即以“庶民历史”取代“精英历史”？在精英历史书写中，被置于边缘、不为重视的角色，甚或只能在暗示中窥见其影子的角色，或只能在落后、非理性、叛乱等指责中占一席位的角色，是否现在反过来成为叙述的中心、成为历史书写的“英雄”，而在精英历史书写中的“英雄”现在则成了“丑角”？

精英和庶民的相对关系是充满矛盾张力的关系，但不是两个独立实体的对立关系。所谓“精英”或“庶民”是对相对关系中的不同位置的命名，而这些位置又是多重不平等的支配关系的交错折迭构成的。这些不平等的支配关系可概称为政治、文化、经济、社会、性别关系等。“精英”和“庶民”的相对关系是对相对固定的不平等的关系的一种说法。可以说，这样的关系是不同作用（本身也是交错复杂的权力关系网络）交错下形成的“果”。因此，“精英”和“庶民”指的是在权力关系中相对固定下来的不同位置，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才是其存在的条件，而不是什么出于自身的本质，因而也不是假设了本质上对立的二分法。

帕拉卡殊(Prakash)在《后殖民评论和印度史学》一文中指出，“庶民”在维持和正常化支配关系的论述中被置于边缘和近乎

隐形的角色。因此，作为服务支配关系的论述的产物，“庶民”只被看成是没有什么价值和重要性的东西。“庶民”能从支配者/精英的位置上说话的论述中留下痕迹也是很勉强的事情。因此，从这些痕迹所能掌握的，只是“庶民”肢离破碎、容貌模糊不清的形象。换句话说，要从刻满了一层又一层支配者/精英的言辞说法的哈哈镜零散的碎片里，重整“庶民”完整的面貌是不可能的。造成庶民历史不可能的二分法哈哈镜不仅仅是殖民统治精英的问题，也是为独立事业奔走的民族主义精英的问题，殖民统治训练出来的民族主义精英也让造就帝国扩张和殖民统治的现代理性和人文主义铭刻了他们的灵魂。帕拉卡殊举一个例子，是关于19世纪初殖民统治引发的印度殉夫自焚的争论。

帕拉卡殊的例子谈了曼尼(Lata Mani)对这场争论的讨论(曼尼这一篇文章也收录在本书)。曼尼细阅了有关应否取缔殉夫风俗争论的历史文件。争论的要点有印度教典章是否认可烧死遗孀，妇女是否自愿地躺在火葬的柴堆上，可以根据什么理由取缔牺牲妇女的做法等问题。按曼尼的阅读，这些争论，不管是反对还是支持殉夫风俗，其论据都是在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奴役妇女与解放妇女的对立以及野蛮的印度教言行与英国的教化使命的对立所界定的框框内进行的。在这样的框框内，殖民统治精英和民族主义精英诉诸建构一个有律法权威的圣典传统，作为印度教风俗起源的根据。但这个由后人在争论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源头”的虚构性，却在争论的过程中，即在二分法的主宰下，被掩盖起来了，曼尼的阅读让我们看到，现代理性和人文主义关于人的普遍性和普遍历史(历史主义)的说法，不但让侵略和征服制造了发展的理据，也强行闯入了受侵犯的“他者”的世界，把当地的人民卷入了时空压缩的剧变的阵痛中，并把现代理性和人文主义的轨迹在当地的精英身上辗过，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曼尼的阅读不但让我们看

到一场关于牺牲妇女的风俗的争论是如何取消了妇女说话的位置,而成为父权在剧变中重新肯定和维持父权传统的机会,她更让我们看到父权(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必须在阵痛中不断重新肯定和维持下去,反映了本身的断层。这些断层就是产生、维持支配关系所掩饰的盲点、沉默和焦虑;探索和细读这些断层,能让我们在官方论述的裂缝里读到不同的故事。换句话说,庶民的历史是在精英的历史内在的矛盾张力处,即二分法的思路最脆弱的地方,把零散、面貌不清、不完整的片断重整出不同的故事来。

一方面,二分法的强暴,使庶民历史不可能;另一方面,庶民历史的可能却是建基在这不可能之上。这是为什么精英—庶民的相对关系不是二分法,庶民历史不是取代精英历史,而是努力使强暴的诅咒的作用卸到一旁。但正是这样,庶民历史研究总也有跌回二分法的轨迹上的时刻,这个稍后再谈。

帕拉卡殊把庶民历史研究看作是后殖民评论的突出的例子,因为庶民历史研究为后殖民评论在实践上的结构性矛盾张力提供了很好的说明。所谓后殖民评论是经历了强暴的洗礼而孕育出来的评论,即是经历了被划为落后的“他者”而遭受到强加身上的统治和改造工程。这样的强暴自然唤起抗衡的意志,但运用这意志的能力却是在强暴洗礼的经历中打造出来的。强暴在破坏中带来了新生及强暴引发的受诅咒的命运。新生孕育于强暴经历的能力(即在强力的支配下,如骤然跌进压缩了的时空,在催赶下要接受现代理性和现代化的改造和训练)既是新生赖以抗衡受诅咒的命运的能力,也和引发这样的命运的那股支配“他者”的力量纠缠在一起。洛特-加龙省(David Lloyd)跟随巴帕(Homi Bhabha)对法农(Franz Fanon)的阅读,称孕育于强暴的能力为“同时代性”的能力。(Lloyd 1995: 260—1)洛特-加龙省指出,在殖民统治下的人民,受到了可能是不可能复原的伤害,命运如同操纵在别人的手

里。现代性的扩张发展一方面把他们卷进了剧变的漩涡中，同时又要把他们排斥到在殖民国家经营的现代性外，又或他自己抗拒进入这样的现代世界。但不管怎样，他们所置身的是不折不扣的“同时代性的空间”。人们抵抗支配的手段不断在这样的空间里创造出来。这些手段所取材的资源，是混杂、不平衡发展的文化，不是传统、也不是现代、而是“同时代性”的文化。洛特-加龙省更说，为现代化论述收编的知识分子，在现代/传统等二分法的规范下，只能陷于国家主义贫乏的形式主义中，没有能力认识人民的“同时代性”的创造力，只昧于寻求把人民改进为有现代精神的现代国民。知识分子这种以置身于领导者之位置发言的理所当然的想像，正是现代“理性”、“选择”二分法秘而不宣的欲望的体现：“中心”对“他者”的控制。控制的其中一个重要手段是“同一化”。因此，庶民如果不是无知的顺民，便是暴民。庶民的“同时代性”的多样性和创造力在二分法约化和抽象化建构“他者”的手段中，变得面目模糊或只能是旁门左道的伎俩，对社会以至人类无多大价值。

“同时代性”是日常生活的领域。对“现代理性”而言，日常生活是在划分为过去、现在、未来的线性时间观里，是在“现在”显现的活动，是经验的表面，充斥了偶然任意的因素。若要认识经验的深层结构或规律，就要能把当中的偶合随机的东西分辨出来，因为它们对了解事物的本质并不重要，即不能通过二分法建构在掌握中的“他者”。二分法建立一系列的二元对立，据此建构“现实”，把“同时代性”置于其视野以外或边缘处，当然跟其本质主义的形而上学倾向有关。即这不仅仅是其盲点，更是其立足点——从这位置掌握的“认知”和“真理”同时是把“他者”置于掌握中的“自我中心”和“他者”的关系的建构，以致种种差异（诸如不同的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种族、性别等）的张力交集，也在二分法的约化和抽象化的作用下，化为相对封闭的主导位置和被主导位置的不平等